

浙西、浙西南土地革命的政治认同与斗争手法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土地革命时期, 浙西、浙西南党组织积极响应党的“八七”会议精神, 根据地方实际特点, 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日常经济斗争, 准备武装暴动, 并且在暴动基础上创建革命武装, 探索游击战争的规律。

关键词 浙西 浙西南 土地革命 政治认同 斗争手法

doi :10.3969/j.issn.2095-3801.2016.01.002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3801(2016)01-0008-06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n West and Southwest of Zhejiang: It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and Method of Struggle

WANG Mingqian

(Maxism School,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the CPC organizations in the west and southwest of Zhejiang province actively led the masses to carry out daily economic struggle and prepare armed riots based on the realities of the local places, following the spirit of the Meeting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Political Bureau Held on August 7th, 1927. They founded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and explored the laws of the guerrilla warfare.

Key words the west of Zhejiang province; the southwest of Zhejiang province; agrarian revolution;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struggle method

土地革命时期, 浙西、浙西南党组织积极响应党的“八七”会议精神, 根据地方实际特点, 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日常经济斗争, 准备武装暴动, 并且在暴动基础上创建革命武装, 探索游击战争规律。笔者引入社会运动理论的相关研究视角, 以政治认同和斗争手法两个概念为线索, 全面考察今浙江省金华市、衢州市属的浙西地区以及今丽水市属的浙西南地区的土地革命, 以期增加学术界对土

地革命史的学术认知。

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 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之一的浙江, 早在 1921 年 9 月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衙前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 为反击国民党当局的屠杀, 浙南、浙西各地党组织, 响应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浙江省委的相关指示, 积极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暴动, 掀起一轮轮土地革命的浪潮。

收稿日期 2015-06-25, 修回日期 2015-09-03

作者简介: 王明前, 男, 江苏苏州人, 副教授, 博士。

1928年8月13日,浙西特委和兰溪县委发动兰溪暴动,打响浙西土地革命的第一枪,起义不久失败。1928年10月10日,中共武义县委领导人邵李清等发动武义起义,成立浙武红军游击队,斗争历时两年之久。1928年10月11日,中共永康县委领导人胡思友等发动永康起义,组建永康农民革命军。1930年1月,中共宣平县委领导人蒋宝贤等发动金华安地起义,成立中国共产党红军北路军游击队,坚持斗争到是年底。1930年4月17日,浦江县委领导人沈振标、金树东等发动北乡起义,成立浙东农民革命军第一大队,开展游击战争。1930年5月,中共宣平县委领导人曾志达等发动吴宅慈仁寺起义,成立北营红军,7月扩编为浙西红军第三纵队,坚持战斗到年底。

1928年7月22日,中共遂昌县委领导人傅以和等发动桃源起义,打响了浙西南土地革命的第一枪,起义军坚持斗争月余,最后失败。1929年12月20日,缙云县东区委领导人杨玉水、杨岩溪、卢湛等发动黄余田起义,成立浙西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

浙南红十三军失败后,浙江土地革命陷入低潮,可是1936年7月在浙西仍然发生了由中共常山县西源区委领导人董日钟等领导的西源起义。

1935年2月初,中共闽浙赣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经闽北苏区折入浙江境内,于3月23日进入浙西南龙泉县境。5月上旬,挺进师在云和县境召开师政委会,确定以仙霞岭为中心开辟浙西南根据地。10月,挺进师主力转战浙南,开辟浙南游击区。

一、浙西、浙西南土地革命的政治认同

塑造共同的政治认同,对于浙西、浙西南共产党人领导土地革命意义重大。“斗争政治的参与者始终操纵、谋划、修改和重新解释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斗争各方的身份”^[17]。具体到浙西、浙西南土地革命,共同的政治认同正是共产党员唤起农民对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的阶级斗争的认同感,是“将人们与某些社会情境而不是其他人联系起来,通过将这些人吸收进那些情境来激活这些身

份”^[12]。在1927年至1938年的浙西、浙西南土地革命中,共产党人通过唤醒贫苦农民的阶级意识,在发动日常经济斗争的基础上,适时树立起土地革命的旗帜。因此,对土地革命的宣传,能够有效动员工农群众参加暴动和土地革命等革命实践,并实现政治认同。

1. 土地革命的动因

大革命失败后,浙江成为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国民党当局推行所谓“二五减租”试图缓和阶级矛盾,但是根本无法解决浙江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浙西、浙西南各地广大农民有着迫切的土地革命要求。

1929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以下简称省委)分析指出:“浙江土地完全建立大中小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关系的状况之下,而小地主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尤其凶狠。”在各阶层农民中,富农、中农、贫农分别占3%~5%、35%~37%、60%。这说明浙西、浙西南农民的主体是贫农。具体而言,虽然“中农的数量在浙西、浙南的天台、仙居及南部福建边界比较多。但那些都是十分蹉跎的山地,没有多大的生产量”^{[3]268-269}。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所谓“二五减租”,根本不能缓和浙西农村尖锐的社会矛盾。地主阶级纷纷增加剥削量以对抗减租法令,“其超过的种数有二:以前没有减的,今年须增加租额百分之几;以前参加减了的,今年须缴原额以上的租额”。总之,地主阶级“总以夺回两年来减租的损额而更多得些利润”,加租额约20%。浙西1929年遭遇旱灾,商人、地主反以高利贷盘剥农民:或者“拥有巨粮的地主,屯债居奇,高抬米价,后用狡诈手段将陈粮借贷农民,限于秋收时以加倍归还”,从而“三月内得二倍之利润”,或者“许多商业资产阶级,看到农民经济的恐慌,米粮的缺乏,就一方面高抬物价,另一方面以三分至五分的月利借给农民以货物及现钱”。浙西各阶层农民的境遇均不同程度恶化。自耕农“锐敏的佃农化、无产化了”,佃农“每年须将全部农产的三分之二纳入地主的皮囊”,加之“今夏大水,田禾淹没,生产量要减少百分之六十,而地主反因取消减租而加

紧剥削”。雇农“每天工作常在十小时至十二小时之间。其经济既如此艰难,弥补之一法只有借债,债欠得多了,只好逃去当兵”^[3301-302]。1929年11月,时任省委书记的卓兰芳在巡视浙西后分析指出:浙西“巨大的富农式的集体式的集体生产不大多见,中小地主的数量非常之多,集团地主的土地(宗祠为最多)各地都很普遍,都是在豪绅地主维持之下,施行他对于农民的盘剥”。总之,“这种小农的生产方法与封建的生产关系,阻止农业经济的发展”^[3311]。1929年11月,省委分析在浙西社会经济诸因素中,伴随着封建剥削关系的还有“帝国主义的商品侵入农村已很普遍”的半殖民地因素。土地问题主要表现在土地的集中和地租剥削沉重两方面。浙西除土地集中问题外,还存在较复杂的所有权关系:“有一部分的土地有田底田面二个所有权”,但这并不能改变土地集中的根本趋势。所谓宗祠土地其实“都在豪绅管理,豪绅俨然和地主一样”,换言之,仍然是封建地主所有制的表现形式之一。土地的租佃条件十分苛刻,“除了一部分土地农民有永佃权外,大部分土地是由地主自由可以换租的”。租佃形式有所谓谷租和银租两种。谷租“是在秋收后缴纳”,银租“先一年交租银,然后可以种田”,类似押租。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银租比谷租的要轻些,但是到了荒歉时候不能再向地主主要回若干租银来,不若谷租遇到荒歉可以要求地主减租或是分租。”可见银租虽然更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但是条件实际上更苛刻。租额普遍沉重,“东阳普遍租额占全收获量十分之七以下,以至十分之五;义乌、永康大概占全收获量十分之四以至十分之六”,只有拥有田面权的地租略轻。沉重的封建剥削使浙西各地农业生产率普遍低下:“土地分配得很为碎小,所以小农式的生产方法成为最大多数的形式。”除义乌南乡一带外,“大部分的土壤是瘠的”。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深刻影响着农村的阶级关系。农村社会各阶层中,佃农约占60%以上,半自耕农占20%以上,雇农仅占5%以上^[3321-324]。

总之,浙西、浙西南地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存在着开展土地革命的深刻社会动因和广阔实

践空间。

2. 以日常经济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

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浙西、浙西南始终没有形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缺乏开展以平分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和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客观历史条件,因此浙西、浙西南党组织因地制宜,根据地方社会实际,把握当地阶级斗争的脉搏,适时领导农民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封建地主阶级展开日常经济斗争。于是,在日常经济斗争实践中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便成为浙西、浙西南土地革命的理所当然的内容。

1927年9月,省委指示浙西党组织应该利用农村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去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省委指出:永康的“农民运动比较有基础,农民运动已使豪绅地主有些忌惮”。但是,“很少是我们同志去领导,往往是农民自己的行动”,结果,“农民往往为地主所欺骗而妥协”。武义的北三乡,“有减租运动,然旋起旋止,没有一致的有计划的斗争”。衢州西乡虽然开展了“减租运动,参加农民三千人”,但是当地党组织“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倾向非常浓厚”。省委因此高度肯定永康党组织在抗租斗争中“号召各村农民在金山抢回被捕同志……持刀和警察战斗”的勇敢行动,“已掀起广大的农民斗争的情绪”^[344-46]。1928年3月16日,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案提出:“在浙西、浙南,农民群众已有基础,统治力量较弱,应该很快的发展游击战争,在乡村中发动土地革命的工作,迅速的造成农民割据的前途。”^[3121]同日,省委指示浙西党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代表自身利益的‘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解放的唯一的途径。”1928年3月27日,省委批评浙西党组织:“过去只是专做暴动的打算,而放弃了日常的群众斗争。这样完全是幻想暴动,是军事投机的表现。”省委要求浙西“工作的第一步是普遍的发展群众斗争,由斗争中去改造党的组织和群众组织,以期发展到游击战争以抒武装暴动”。具体而言,在遂昌、兰溪、永康等县,“当此春荒期间,在农村中,应即提出‘抑平米价’、‘向豪绅资产阶级借粮’(或更进一步提出‘吃大户’、

‘没收资本家的粮食’）、‘向资本家借钱买种子肥料’、‘反对推销公债’、‘反对照征钱粮附加军事特捐’、‘反对土豪劣绅管理寺庙祠产’、‘将寺庙、祠堂的存粮分给贫苦的农民吃’、‘找还去年已纳的应减的租谷’、‘增加工资（雇农特有的口号）’，发展农民斗争”在此基础上，“发展到杀戮土豪劣绅地主，以扩大游击战争的局面”^{[3]138-142}。1928年5月，省委指示浙西特委要利用尖锐的社会矛盾形成的斗争形势，引导农民开展日常的经济斗争，进而发展到暴动和游击战争。省委认为：“普遍的粮食恐慌，一切军事附捐的剥削，使农民感受痛苦，农民的经济要求是非常迫切的，发动群众的经济斗争很有可能。”这种日常的经济斗争的前途势必是游击战争：“斗争一起，白色恐怖一定要来，又逼着我们非实现有组织红色恐怖不可。所以，这一次斗争发动起来以后，必然很快的要转入游击战争的阶段中去。”省委特别指出：“应找定农民生活最苦及我们组织力量最大的区域先发动。”^{[3]167}1928年7月，省委指示浙西特委：“浙西的工作任务，应该是积极煽动工农群众发动城市与农村的日常的各种斗争”，进而在“如兰溪之永昌、诸葛等区，组织游击队伍，以游击战争的方法杀戮豪绅地主，夺取反动武装，发动群众的斗争。”^{[3]205}1928年10月，省委也要求永康和武义县委：“应即停止这样玩弄暴动的盲动行动，转移工作的路线到发动群众日常斗争这方面来。”^{[3]246}1928年11月，浙西特委指示武义县委：“你们须根据农民要求：减轻田租或抗租，不准佃业撤田，借贷利息减轻，抗加盐税去发动日常斗争”，鼓励他们：“只要你们去领导斗争，时时可以喊出经济的政治的适应群众要求的口号，都可以调动广大的群众起来斗争”^{[3]251}。1928年11月，浙西特委指示宣平县委：“应该‘坚决的继续坚持以工农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不断的扩大斗争，从斗争中去组织群众’”^{[3]253}。

浙西党组织还针对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欺骗性较强的改良主义政策展开斗争。1929年11月，省委认为浙西“统治阶级的政权在形式上虽然并不稳固，但是社会中阶级的矛盾也并不尖锐”的客观

形势，决定了“发动日常斗争在浙西还是主要的策略”。具体而言，浙西党组织应坚决反击国民党当局推行的改良主义的土地陈报和村里制的反动企图，明确土地陈报“对于地主阶级决不会给以认真的打击，它决不愿变更土地关系，它只是对于农民加以更厉害的剥削”，以及村里制“是豪绅地主阶级直接压迫民众剥削民众的统治机关”的反动本质^{[3]315-316}。1929年11月，省委指示浙西党组织：“组织农协与村里制抗争，这是目前农村斗争的主要形式和内容。”^{[3]326}

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师党委提出：“在党彻底分配土地的口号基础上，必须防止借口条件未熟的土地斗争中的尾巴主义；另一方面，对整个形势估计不足的‘左’的盲动行为亦是值得严格注意的。”^{[4]113}挺进师在浙西南游击区坚决执行打击地主阶级的政策，如1935年7月，挺进师宣布没收地主包昌富的全部财产^{[5]22}。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组织适时改变对地主的政策，允许地主以自愿捐献的方式与党合作，如：1936年10月，寿泰庆景中心区委接收景宁县地主周裕方一百元捐款^{[5]34}；1937年3月，龙浦县委接收了浦城北乡“素无恶窄工农”的地主戴春和“自愿捐款”250元“以助革命战争经费”^{[5]37}。

3.革命的阶级路线的贯彻

浙西、浙西南党组织在领导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坚决贯彻革命的阶级路线，依靠贫雇农群众作为土地革命的群众基础，联合中农，坚决反对富农对土地革命的干扰。

1928年11月，浙西特委指示宣平县委：“坚决的站在雇农的一方面领导斗争并组织雇农建立乡村无产阶级的组织。”在斗争基础较好的北乡，“须组织村农协或村农民委员会，召集各村农会代表会议产生区农会。各级农会执委，须是贫农雇农佃农，由农民群众选举出来”^{[3]254}。1929年3月，省委在总结浙南温州、浙西兰溪和浙东宁海三个暴动的经验时批评指出：“农会组织在流氓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没有真正的农村无产阶级贫民来领导，参加农会组织中的中农，更是动摇不定，盲动主义

便在流氓无产阶级意识的影响下发出来。”省委认为：“单纯的减租口号不能号召更广大群众起来”，因为这一口号“仅仅是一部分佃农及半佃农群众需要的口号。尤其在这个单纯的减租口号，不能号召雇农及农村无产阶级起来参加”^{[3]273}。1929年11月，省委指示浙西党组织：“党应该用力去征服中农为贫农可靠而有力的同盟军；对于富农则应无条件的反对之。”^{[3]326}

二、浙西、浙西南土地革命的斗争手法

创建人民革命武装和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是浙西、浙西南土地革命主要的斗争手法。这符合中国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基本规律。土地革命时期，各地共产党人在发动武装暴动和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如何建设革命武装的问题。白手起家的浙西、浙西南共产党人缺乏现成的正规军事力量的帮助，而这样的正规军事力量本来是天然的“暴力专家”，他们“遵循自己的逻辑。他们通常从事剥削和机会累积，有时候牺牲自己普遍的雇主或支持者”^{[2]38}。相反，这些正规军事力量属于国民党当局反动阵营，是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因此，浙西、浙西南共产党人只能依靠毫无军事素养的农民群众来创建革命武装。由于这些缺乏日常军事训练的工农群众在暴动后并不能自然地转化为熟练的暴力专家，这无疑增加了浙西、浙西南土地革命的难度。但是，浙西、浙西南革命武装的建设仍然在革命化、正规化的道路上顽强探索。在这一艰辛历程中，浙西、浙西南党组织一方面坚持以工农群众为革命动力的武装建设方向，一方面认真探索适合浙西、浙西南地方特点的游击战争规律。

1. 对革命动力问题的探索

1928年3月，省委批评浙西党组织：“应马上推选一部分勇敢忠实的农工同志，组织工农军，开展武装训练工作。”^{[3]141}1928年10月，浙西特委批评永康县委和武义县委：“你们斗争不建筑在工农群众上面，而靠几个士兵……这是军事投机，军事冒险，亦必定失败。”^{[3]245}1928年11月，浙西特委指示武义县委：“须加紧工农武装组织和

训练，最好你们将暗杀队改为工农武装基本的组织加以训练。”^{[3]252}特委的指示有助于工农武装的群众性和正规化建设。1929年3月，省委在总结浙南温州、浙西兰溪和浙东宁海三个暴动的经验时指出：“暴动的群众，只有一部分是农民群众，没有广大的群众起来参加”结果，“暴动成为无目的的简单的军事行动”。省委尤其批评三个地方在领导暴动工作时对群众武装性质的错误认识，批评三地党组织：“误解只有群众的武装组织可以维持群众斗争的胜利，因此特别重视群众的武装组织，幻想联络土匪暴动，或是用土匪的武装力量帮助群众的斗争”结果“完全抛弃了群众组织工作”^{[3]272}。这里省委认为三地党组织把土匪错认为群众的武装组织，结果反而没有认真组织好群众自己的武装建设。

2. 对游击战争规律的探索

在坚决依靠群众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上，浙西、浙西南党组织还领导群众艰苦探索游击战争的规律。

1928年7月，省委在指示浙西特委时明确提出：“游击战争的任务是在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而且求斗争之扩大与发展。至于杀戮豪绅地主，夺取武装是执行此任务上的必要手段”，总之，“游击战争是不能脱群众的”。省委特别强调：“斗争起来以后，决不能占据乡村市镇组织苏维埃，造成乡村巨变割据的局面，否则很易为反动派武装所扑灭。”^{[3]206}这说明省委已经充分认识到游击战争的长期性，自觉地探索游击战争的规律，其中隐含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涵义。1929年3月，省委在总结浙南温州、浙西兰溪和浙东宁海三个暴动的经验时，批评永康、武义的武装斗争，“不适应群众的需要，不注意群众在斗争中需要斗争与否，始终是单独的军事行动，用暗杀的手段杀戮豪绅地主或是烧豪绅地主的房屋”。省委认为这种“烧杀主义和军事投机的倾向”，只能使农民群众“受着反动阶级更大的压迫，农民群众更表现恐慌”，并不能起到激发群众参加斗争的意义，“因为这些群众并没有从斗争中爆发出来的”^{[3]274}。可见，浙西党组

织充分认识到群众基础对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意义。

浙西南党组织经历着和浙西党组织同样的考验。1928 年 4 月,省委指示遂昌党组织:“遂昌工作的策略,还是发动农民斗争,并且迅速准备乡村游击战争的发动。”^{[3]148}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后,师党委提出:“在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中,应注意分出和组织新的游击队与游击小组,配合与领导各该地区的斗争,创造新的游击区。”^{[4]113-114}为打破国民党当局对浙西南游击区的“围剿”,政委会和挺进师提出:“在敌人进攻时,应绝对的避免正面的战斗和对峙局面,必须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给敌人奇袭、夜袭、埋伏与侧击;另方面应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突然的袭击敌人的后方,发动广大的群众,彻底的破坏敌人进攻路线或必须转移地区的交通要道,尤为重要是应发动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与储蓄自己的必需的粮食。”^{[4]124}

综上所述,土地革命时期,浙西、浙西南党组织积极响应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根据地方实际特点,积极领导群众开展日常经济斗争,准备武装暴动,并且在暴动基础上创建革命武装,探索游击战争规律。

参考文献:

[1]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泰罗,查尔斯·蒂利.斗争的动力[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71.
[2]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M].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浙江地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浙南游击区[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5]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浙西南游击根据地[M].丽水:中共丽水地委党史研究室,1995.